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Xu Jilin

许纪霖 著

回归公共空间



Back
· 回归公共空间
to the

许纪霖 著

Public Space

by Xu Jili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公共空间/许纪霖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14-04375-0

I. 回... II. 许...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785 号

书 名 回归公共空间
著 者 许纪霖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75-0/C·84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一 反思大学体制

- 1 北大改革的多维分析
 - 北大新政:激活高校改革 1
 - 学术自主:知识分子的自我立法 3
- 2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
 - 从质询政治到商议性政治 6
 - 商议过程中的公共理性 11
 - 转型政治中的商议性民主 15
- 3 比较视野中的大学理念
 - 大学理念何妨多元 19
 - 小的就是好的 21
 - “没有男人的长春藤” 24
- 4 大学教育的反思
 - 研究生导师的“三难” 26
 - 谁该享受公费? 28
 - 研究生教育,哪些人该由国家买单? 31
 - 大学生们为什么逃睡在外? 33

善待学生,方是大学风范	36
博导为什么成了非驴非马?	38
5 从考试看社会分层制度	
考博制度中的两种正义	40
学院精英与社会大众的断裂	43
考研变高考的深层困境	47
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	49
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	51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哈佛女孩”?	53
6 知识生产体制的审视	
知识生产体制的“再度国家化”	55
计划学术何时休?	59
大办文科与“高大全”	61
学术不端如何防范?	63
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65

二 突发危机透视

1 近距离体验 9·11	
今秋流行星条旗	71
"Say no to war! "	74
2 9·11 事件与全球正义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77
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	84
如何建构正义秩序	89

3 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	
万民法的底线人权法则	96
人权的多元文化渊源	100
万民法的伦理依据	105
4 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	111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的尴尬	113
理性的美国与情感的美国	117
5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危机中的民族国家认同	121
社群的缺席	126
什么是公民意识?	131
三 日常生活批判	
1 上海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反思	
颠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	140
多元的中西文化传统	142
当代上海文化的单一化	146
2 都市的文化空间	
文化都市如何营造	150
想象的乌托邦	151
新上海人的天下	154
不方便的现代化	156
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	158

- 3 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社会
- 数目字管理下的数字化生存 160
 - 赢者通吃的逻辑 162
 - 说英语的上流社会 164
 - 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 167
 - 职业精神的内在资源 169
 - 何谓大国? 171
- 4 焦点事件中的内在悖论
- 女排让球背后的理性悖论 173
 - 从刘涌改判看两种正义 175
 - 要金牌大国,还是体育大国? 178
 - 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 180
- 5 社会生活的背后
- 还熊德明普通公民之本色 182
 - 从梅艳芳看“界” 185
 - 药方里的秘密交易 187
 - 读经的困境 189
 - 三联的文化品牌 191
 - 盖棺论定可以休矣 194
- 6 多元化的阅读空间
- 网络时代的业余知识分子 196
 - 公共舆论的传统 200
 - 过去的《读书》 201
 - 史学如何走向公共知识? 203
 - 世间已无罗尔斯 205
 - 日神精神的再现 208

人性的炼狱:我看《孔雀》 210

四 当代思想观察

1 启蒙的命运

新启蒙运动的由来 215
公共思想界的出现 217
新启蒙运动的同一性 219
潜在的批判性反思 221
90年代的分化 224

2 启蒙的自我瓦解

90年代的启蒙分化 230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238
作为主体性的人的解体 244
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认同 249
世俗社会的神圣性问题 253

后记 259

一 反思大学体制

1 北大改革的多维分析

北大新政：激活高校改革

这是一场让人盼望已久的改革。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竞争和流动,让人才在竞争中流动起来。这正是中国高校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一直缺乏的东西。教育、学术和其他产业一样,缺乏竞争势必会造成故步自封,造成垄断。北大尝试做的可谓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从这些年的大学改革来看,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大大增加,大学的财力加强,但高校体制仍稳固保持既有格局。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要成为世界教育强国,仅仅有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名校和学科钱不少,却乏善可陈,教育学术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高校和高校改革来说同样适用。北大改革是本届政府任期内高校序列改革跨出的第一步。北大一直是中国高校的精神领袖和学术领袖,北大跨出这一步,意义非同小可。一石激起千层浪,类似

的改革举措很快就会在全国推开,高校师资大规模流动即将到来,高校封闭、垄断的格局随之被打破,学校之内和之间将进入相对完全的竞争状态。这是高校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名校拥有全国一流的学生,未必尽是一流的教师。名校学生能否得到一流教育取决于偶然,遇上平庸之辈,就未必能获得一流的知识。师资不流动,无竞争压力,不少教师符合所谓科研考核底线,即可按部就班晋升,高枕无忧,误人子弟。据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分析,现代教育是一个文化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名校毕业生拥有最具社会象征资本的荣誉,社会精英也大多出身名校。现代社会常常不是以能力取人,而是以学校出身取人。但在中国,由于师资缺乏流动和竞争,一些名校徒有其名,无法为学生提供一流的教学,学生看不起老师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有改革人事制度,选优汰劣,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名校及其学生名副其实。

师资的封闭和垄断在教书育人上是低效,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是不公。合理公平的分配应当使资源向最具有学术生产力的单位和个人倾斜,使最优秀的教师享有最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和学生。现在名校占据了大部分的教育资源,因为缺乏竞争和流动,其他学校的优秀教师往往难以获得名校那样良好的教育、学术资源。而不少所谓名校教师却在糟蹋这些资源,特别是一流的学生。这种低效不公的局面不尽快改变,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是空话。

在哈佛,到了年限不被授予终身职位,在别处闯出天地,再被请回哈佛的,比比皆是。那种不是以自己的学术能力,而是靠名校作金字招牌的,最有可能是这次改革的被淘汰者。北大不是谁的囊中私物,它不是现在北大人的北大。北大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属于全国,也属于世界。我们应当以这种眼光来看北大的改革。北大李强教授分析得好,北大改革是场“负和游戏”,也许无人受益,但北大自身是真正的得益者。据我的判断,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和措施一旦推开,整个中国的高校都将会是得益者。因为,通过改革可以发掘教育系统的内在潜力,合理调配教育学术资源,创造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教育学术竞争

环境。

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多,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全盘改革只会陷入思维误区。不少人提到的高校政工人事制度、科研考核制度、教授治“学”等问题,的确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从教师人事制度这一步开始改革。后者既触及教育体制一大核心问题,在现有条件下,阻力又相对较小,对于培养人才、建设一流大学效果也更直接一些。北大改革从此处突破不失为明智之举。我也希望北大不负众望,改革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学术自主:知识分子的自我立法

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全国的轰动,与其说触及了部分青年教师的既得利益,不如说引起了社会对中国高校制度的大反思。有人说:主事者过于张扬,改革尚未出台,已经满城风雨。改革犹如打仗,兵贵神速。不过,在我看来,这次北大改革好就好在不玩法家的威严、兵家的伎俩,而是走“商议性民主”路线,让大家有时间和有机会充分讨论。而主事者也数易其稿,尽可能让改革方案比较完善。

这是一次必要的改革,也是一次不完善的改革。作为高校系列改革的起步,它的意义不在彻底改变旧体制,而是暴露旧体制的弊端。事实上,在方案的第一、二稿中,对于旧体制基本是绕着走,仅仅引进了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打破了青年教师的铁饭碗而已。问题在于:当竞争加剧以后,谁是竞争的仲裁者?在目前大学官本位的格局之下,教师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被学校大大小小的行政势力所操控。假如这一问题不解决,劣胜优汰、劣币淘汰良币这些“负竞争”现象将愈演愈烈。

批评北大改革的各种声音,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一点,而改革的设计者们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据报道,在即将推出的第三稿中,将有重大的突破,将设计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审制度,重点在于院系一级将成立“学术自主的教授委员会”,负责教师的职务晋升和考核工作。

假如这是方案的最终结果的话,我们有理由说,北大改革开始向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开刀了。

学术自主和教授治校,这是国际上所有一流大学的通则。大学教授,不是出卖知识、出卖脑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大学的真正主体。教授治校,意味着学校所有重大的公共事务,都应该由全体教授或教授代表会议参与决策,而不是由行政当局单方面说了算。教授治校,在目前大环境还不成熟和现行相关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教授治学,也就是学术自主,已经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学术自主,意味着凡是涉及到教师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诸如教学课程设计、研究项目选择、科研成果评价、职务晋升和学术奖罚等等,不能由外在的因素——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说了算,而只能由教师共同体,或者是以全体教师成员的平等民主方式,或者是以教授为主体的精英民主方式自主决定。在旧体制下,也有所谓三级学术委员会,即系、学科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主持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但是,这些学术委员会都不是“学术自主”的。不仅其成员由行政任命、评审规则由行政制定,而且其评审结果也常常会受到长官意志的干预。学术委员会当中,不学无术者大有人在,打招呼、拉关系、递条子是家常便饭,官场上的权力逻辑和市场上的金钱法则在学术名利场上畅通无阻。所谓的学术腐败、学术不公也因此应运而生。

法国大思想家布迪厄指出:在当今的大学形态中,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官僚制度,将学校也当做企业一样管理,要求文化生产者接受和采纳工作效率、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并且将这些规范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另一方面,学院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使得文化生产者在国家庇护下,可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却通过各种拨款或基金委员会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于是,“日丹诺夫规律”出现了:“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的身

价。”因此,知识分子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反抗将外部的市场、权力和意识形态原则引入到学科内部。特别在学院内部,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在知识共同体内部,制定一种标准的对话规则,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这样的规则是自主的,是知识分子自我立法的规则,不屈从任何外界的市场或权力法则或掺和非知识的因素。

我们可以将这次北大改革也理解为一场知识分子自我立法的努力。事实上,学术自主不是自北大始,三年前,早在东北师范大学就开始试验:在各院系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院系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的行政负责制。东北师大的改革结果不得而知,然而,一旦北大走出这第一步,以其公认的领头羊地位,势必会在全国大学产生示范性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意味着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成果,也意味着有一流的制度。一流的制度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鼓励学术创新、是否有利于学术自主。从人才竞争流动走向学术自主,北大的改革正在向旧体制一步步进逼,艰难地探索着中国环境下的制度创新。

2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种民主的实践过程之中。部分农村地区实行的“村社选举”,是一种基层的选举民主的尝试,那么,在城市里面,在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比较高的中大城市,除了选举民主之外,还有什么民主形式可以实践?近十年来,在欧美社会,出现了一种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民主主要旨在于:凡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决策,在实施之前必须在公共领域中,由公民们按照公共理性精神予以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按照商议性民主的

理论,公共决策乃至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公民的商议基础上的。^①

在欧洲和北美,商议性民主是在自由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里面实践的。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政治的社会里面,商议性民主是否有实践的空间?假使有的话,它是如何形成的?需要什么样的外部条件?公共讨论应该如何进行?

从质询政治到商议性政治

对商议性民主的规范性研究,以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为代表。近年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总体框架之下,发展出了一个超越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上的“第三种民主”的规范模式,即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虽然从形式上说是上述两种民主的整合,但从精神旨趣而言,更多的是对共和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挥。他强调,所谓政治,实际就是民主的意见和意志的形式,其形成的过程不仅表现为议会中利益的妥协,而且也与公民的政治公共领域的自由商谈有关。商议性民主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将涉及到正义问题的商议规则和辩论形式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议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商议制度形式,最后,非正式的意见形式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行政决策当中,通过它们,交往权力转换成了行政权力。因此,公共权威也就获得了厚实的合法性基础。^②

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民主政治虽然只是一种规范意义的理想类型,还远远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完全建制化,但我们看到,欧洲这些年来“第三条道路”和“新左翼”的政治实践与此颇多呼应之处。欧洲“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积极提倡一种“对话民主”,按照他的理解,“民主不是定义为是否所有的人都参与它,而是定义为对政策

^① 关于商议性民主的讨论,可参见陈家岗编选《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

^② 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曹卫东译,载《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79—293页。

问题的公共商议”。这就是说,在“对话民主”的架构之中,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是像古希腊城邦制度那样,人人参与政治,而是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决定,都来自充分的自由讨论和公共协商。“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①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哈贝马斯的这一商议性民主,有没有可能在缺乏自由民主宪政平台的当代中国转型政治中,有实践的空间呢?这里,我将以2003年北大的教师聘任制改革(以下简称北大改革)为例,说明商议性民主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政治之中有其实践的可能性,它不仅可以为开明的权威政治提供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也有可能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平台转换。

北大改革作为商议性民主的个案,并非主导者有意设计或推行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参与的不经意间形成的。它有一个从咨询政治转向商议政治的不自觉过程。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顶尖学府,近年来校方确立了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按照“985”工程计划,给予了北大三年18个亿的特殊支持。北大校领导深感现有教师聘任制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规矩,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北大从2003年初起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到5月中旬推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全校教师听取意见,预备尽快实施。

从改革的最初设计来说,依然是一种符合主流体制风格的“民主集中制”式的传统改革思路,由权力主导者确定改革方案,然后自上而下地交给群众在单位体制范围内讨论,通过组织系统反馈到决策层,经过修改后最后拍板实施。这是一种开明权威体制下的咨询政治,由行政权威

^①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18—119页。

通过体制内部的咨询管道,听取属下意见,以便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

不过,这次北大改革方案的设计,大思路虽然由校领导决定,但整个改革方案的设计,没有像过去那样,交给人事部门的行政官僚起草,而是聘请了校内一批管理学和行政学专家组成起草工作小组。组长是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批以改革自命的知识分子,大都曾留学海外,见过世面。他们与行政官僚不同,不仅有方案设计的技术能力,而且有改革的总体理念、战略思路和理论预设。正如《商务周刊》一篇文章所评论的:“这是一次由制度经济学家们和从国外学习了公共管理先进经验的海归们亲自操作的制度设计。”^①行政官僚由于其身份和技术理性的内在限制,一般不会参与公共讨论,但专家学者不一样,他们自己独特的理念,有辩论的激情,有将理性从私下运用发展到公共运用的可能性。^②当后来改革方案在网络和媒体受到质疑以后,张维迎、李强这批具体负责方案设计的学者们,通过媒体系统与反对者进行辩论,从而形成了商议性民主的大场面。

以往类似的征求意见方案,都是通过院系的教师会议传达,听取意见。但北大改革方案推出之际,正值北京非典猖獗的时候。学校尽量避免集体开会,人事部门遂改为用电子邮件发给每一位教师。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哲学系、历史系、法学院等一批文科的青年教师,在他们看来,这一改革方案不触动现有教授的既得利益,而对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和教授规定了其他高校所没有的严苛条件,特别是两次申报不成功的,就要被淘汰出北大这条规定,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慌。

中国的高校到了 21 世纪,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利益分化。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高校的投入非常有限,高校教师的收入差距和所

^① 高昱:《为什么我们关心北大教改?》,《商务周刊》,2003 年 7 月 16 日,第 14 期。

^②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 24—25 页。

拥有的资源差距也不大。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高校、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顶尖高校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但庞大的资源基本控制在行政手中,并且向少数学术精英倾斜,而一般教师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改善。原来的职务晋升制度还使他们有往上升迁、进入精英阶层的希望,但新聘任制改革的推出,使得青年教师发现自己将面临一个空前残酷的生存竞争。其中一位这样写道:“关于人事改革,我们都愤怒得不能形成文字了,只是没有失望到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了。唯一的希望是系领导能够为我们青年人说说话,也是为我们这个专业的前途说说话。我们吃的连草都不是,挤出来的却是牛奶。”^①

2003年的中国,后来被称为“公民维权年”。这一年中,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湖南的黄静事件、四川的李思怡事件、河北的孙大午事件等等,都围绕着公民权利这一轴心展开。北大的青年教师们感觉自己在新一轮改革中将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一改过去对学校事务的冷漠,私下频频联络,酝酿通过诉诸舆论,捍卫自己的权益。

如何伸张权益?在公共媒体不发达的时代,申诉者只能在校园体制内部,通过院系的层层反映或与学校领导对话等形式提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开明权威的咨询政治下展开。然而,1990年代以后,公共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在过去,媒体更多地体现为党和政府的喉舌,90年代以后随着媒体产业化的深入和媒体人对自身职业理解的改变,一些非主流的报纸、杂志等,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和评论,媒体比以前更多地扮演了领导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功能。即使是一些主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也在这股潮流面前,开始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而北大,作为中国大学的领头羊,“五四”以后就是舆论关注的中心。北大无小事,这次教师聘任制度的改革,终于让敏锐的媒体所捕

^① 《北大大部分教师对校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摘录》,《思与文》网刊, <http://chinese-thought.unix-vip.cn4e.com/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121>